

战斗在不同战场^①

讲述者

孙康（1906—1996），中山沙边村人。1922年考入县立中学，期间参加新学生社中山分社，发动择师运动。1926年参加省青年运动养成所二期学习，加入共青团，7月回中山从事改组国民党和农民运动。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，当年率张家边农民自卫队参加卖蔗埔起义，被当局通缉，大革命失败后，辗转南洋从事革命工作。1933年返乡秘密从事抗日救亡宣传。1936年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盟。1936年底后，参与重建中共中山支部、县工委、中共中山县委，均任书记。1938年4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。1940年夏秋间，调往印度支那做华侨工作。1948年初，回香港参加华南分局召开的“八月会议”，随后赴滇桂黔边区传达会议精神，留任边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宣传委员会书记、党委秘书长、边区公学教育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、宣传部副部长、工矿部副部长，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党组书记、副厅长，省高级法院院长、省人委副秘书长。1972年离休回广东中山。



孙康

寻找党组织征途中开创抗日事业

1933年夏天，我回到沙边乡，隐居家中约有半年，未曾外出起劲，但已经知道国民党当局由于人事的变迁，对过去通缉我的事不再追查。于

^① 摘自孙康：《革命回忆录》，1983年。本文标题和文中小标题及引用标注均为编者所加，因体例关系，文字略有改动。以下注释如无说明均为编者注。



孙康曾工作过的沙边小学

是，我就开始出来活动。不久，我就在沙边乡教书，以后担任校长之职，直到1935年秋。

1933年7、8月间，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澳门来信，信中说我伯父从海外归来，约我到澳门南环x号楼下见面。我知道这是组织约我会面的通

知，便立即前往澳门，但接不上头。邻居告诉我说：“此人已搬走。”是什么原因？我不清楚。回家后，我找组织的心更急，希望再有信来，但始终没有第二封信。后来，我意识到：光靠党来找我是被动的，要下决心创出事业去找党，要让党组织在我的具体活动中来识别我，检验我。

于是，我在任教期间有意识地广泛开展校际交友活动，从中了解大革命后尚存同志的情况。当时的活动发展到三乡、南朗、石岐等地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根据当时社会情况和知识青年的要求，办了“中山新文字协会”、“中山世界语协会”、“读书会”、“中山话剧协社”等组织，通过“中山新文字协会”宣传党的主张；利用“中山世界语协会”搞社会主义宣传。中山话剧协社演出了《烙印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剧目，宣传抗日救亡。这些活动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，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。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。这时，党组织也在找我，认识了我。

通过校际活动，我认识了五区大布小学教员曾谷。后来曾谷回广州读书。我们继续在“中山新文字协会”和“中山世界语协会”方面互相来往。1936年初，曾谷来信约我去广州，在石室附近与广州“中青”的领导成员林振华见面，并吸收我加入了“中青”（这个组织是从上海来的党员王均予在广州组织的“中国青年抗日同盟”的简称）。后来广州“中青”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麦蒲费到中山，带来发展“中青”的任务；温焯华和林振华也作为联络员到中山，通过种种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纲领。

在向广州找党的同时，我还以“中山世界语协会”、“中山新文字协

会”的活动为名，多次到香港寻找党组织。活动中我认识了香港“世界语协会”的负责人，并了解了这个协会是党的外围组织，后来找到一间杂货店——当时党的联络站（我忘记了跟我接头的是谁）。我详细汇报了回乡开展各种活动的情况，接受了发展“中青”的任务，还带回一些从江西苏维埃来的宣传品。

重建中共中山县委

1936年，香港南委^①和广州市委先后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。

1936年5、6月间，“中青支部”在沙边成立，最初恢复（组织身份）的只有几个人，发展了陈嘶马、孙晖如、孙一之、孙继普。书记是我，组织委员是陈嘶马，宣传委员是孙一之。到1936年底，“中青支部”已发展到特支，再发展到中共支部，成立了县工委。我是书记，孙晖如是组织委员，孙一之是宣传委员。

省委成立时我是省委委员，张文彬是省委书记，李大林（后来脱党了）是组织部长，梁广是工人部长。参加省委的还有罗范群、吴有恒、区梦觉等人。当时，除了香港工委外，中山县委是比较大的。

1937年夏，中共中山县委成立。县委书记是我，副书记是孙晖如，组织部长是梁奇达，宣传部长是徐云，青年部长是邝任生，后来邝因工作需要兼任斗门区委书记，青年部长由黄峰接任一段时间，后来是叶蔚文（叶向荣），妇委是梁绮卿。邝任生和徐云的



位于中山石岐民生北路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机关旧址——太原第

^① 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，由薛尚实、饶彰风、莫西凡等于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。

关系都是通过南委和广州市委来的，后来徐被派去九区开展革命工作。

县委成立后，办了几件大事。

第一，开办党训班。第一期地点在县立七小后楼，后来移到石岐三公祠，由我主持。孙晖如、梁奇达、徐云、黄峰等担任教员，讲授党的建设、统战政策、游击战争等内容。由党训班毕业的学员分别组织了各区区委。谭桂明任四区区委书记，曾谷任副书记；叶向荣任一区区委书记；郑迪伟任五区副书记；冯连枝任三九区委书记；八区区委书记则仍由邝任生兼。由于有了这批骨干，中山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，也为党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开办了多期游击训练班，训练培养了游击战争骨干，成为我们日后开拓五桂山游击区的准备。同时还开办了妇女训练班、青年训练班，分别培养了各区各乡的妇女骨干和青年骨干，为开展抗日群众运动打下良好基础。

第二，创办《别动队》的期刊，使之成为县委的喉舌。第一期期刊还由我写了《中山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一文，并通过各区的刊物和乡报，如《桂山月刊》《沙边乡报》《牛起湾乡报》等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抗战的方针政策。这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抗敌的勇气和决心。

我们还分别通过杨志坚打入了县民教馆，通过曾谷占领了四区民教馆，通过孙一之占领了五区民教馆阵地，公开宣传我们的抗战主张。同时还通过若干党员群众，占领许多区乡学校。

第三，在群众大发动的基础上，成立“中山县青年抗日先锋队”（以下简称“抗先”）、“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”（以下简称“妇协”）。“抗先”、“妇协”是由当地农民子弟及华侨家属子弟以及城市贫民学生等为主体的，为五桂山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。“抗先”总队由当时的统战对象、县长张惠长担任总队长，我任副总队长。各区区队长也一样由统战人物担任正职、党员担任副职。但实权是牢牢掌握在我们党员手上。“妇协”也是这样，刘紫云同志担任副会长，正会长由统战人士薛锦迥^①担任。由于群众组织有了统一领导机构，各地又有分支组织，这就

^① 薛锦迥为时任县长张惠长的妻子。

成了全县发动群众的有力堡垒。

在广大群众发动的基础上，我们顺利地开展统战工作。由于形势的迫促及我们耐心的工作，一些当时较开明的上层人士逐步靠拢了我们。如县长张惠长、四区区长孙海筹、五区区长孙子静



中共中山县委成立的别动大队，孙康任大队长。

等，这就更好地发展了群众运动，扩大了抗日的力量，大大地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对我县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第四，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，成立游击大队（叫别动大队），区“抗先”的骨干党员参加，成为党的一支游击武装队伍。由我任大队长，欧晴宇、缪雨天任副队长，谭桂明、曾谷任政治领导。1939年夏天，日寇企图在横门登陆。我代表组织去说服张惠长坚持抗战，并成立县抗战前线指挥部，由我任总指挥，谭桂明、曾谷、欧晴宇等任副总指挥，由谭桂明等率领队伍开赴前线，与日寇对峙，打响了中山抗击日寇第一枪。当时张惠长带领13个中队在横门，只在第二线守望。我们经过几天的战斗，终于打退了日寇的入侵，赢得了中山抗日的辉煌胜利的先声。这次横门战役的胜利，使我党在全县人民心中大大提高了威信，鼓舞了中山人民的抗战信心和热情。后来，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逆流到来，中山县的抗战形势突然乌云笼罩。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林卓夫带头，伙同反动军人吴康楠、吴飞与张惠长一起，在“抗先”、“妇协”不断发展壮大的声势下，突然袭击。不久，又假借名义召开“抗先”干部会和代表会，由林卓夫带头，强迫“抗先”接受“三个一”（即一个领袖、一个党、一个主义），对“妇协”则以勒令改名相威胁（实际企图插手）；吴康楠则以军人理应只知服从命令来威胁。我们曾有理有节地加以反击。林卓夫等恼羞成怒，不久即封闭了我任校长的“七小”，派兵围捕我，解散“抗先”、“妇协”和游击大队，并且下令通缉我，命吴飞带兵前来“七小”捕捉我。由于事前得到区长孙海筹的通知，我提前离开了西樵，转去长命水村隐蔽。1939年9

月，我接到广东省委通知，到香港等待分配工作。

转战“印支”，做侨党抗战工作

1939年冬，中山“抗先”被停止活动，县“妇协”被封。这时，我在中山身份由半公开变为公开，完全暴露了。国民党下令通缉我。省委决定把我调离中山到香港去。在香港的短期时间里，我总结了中山前一段的工作。1940年夏秋间（具体日期记不清），华南分局调我去印度支那做侨党工作，同行的有刘紫云和许力球夫妇等7人，还有一个郑国英同志。因为当时泰国侨党东北部的组织被破坏，干部被打散。翁向东同志（当时是该地侨党的负责人）回来向分局汇报，并提出要求派人去开办训练班、恢复那里的组织。那时分局直接和我联系的领导人是连贯（曾任周恩来总理秘书），和我有关系的梁广找我谈了两次话。因为当时我是省委委员，他们怕我思想不通。两人详细交换了意见，我愉快地接受任务，赴印度支那工作。

当时，先经海防到河内直接到老挝境内的他曲，路途很崎岖，有崇山峻岭，有原始森林，到处山岚瘴气，人烟罕见。他曲是湄公河边的小镇，对面便是泰国，就在这里办寮东公学，我当校长。那里接近泰国，便于泰国东北部的干部和侨生来学习。当时公开说是办一般的中学，但里面是培养侨党干部。老挝是法国的殖民地，印度支那的一部分。当时泰越关系紧张，因为背后有法殖民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争权而造成矛盾。泰国边界被封锁，学生过不来学习，结果因学生人数不多，寮东公学只办班不够一年时间。因此，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转移到寮国（即老挝）一个叫沙湾拿吉的地方。那里原来有一间华侨学校，我去当校长。沙湾拿吉地方较大，华侨也多，容易掩护。原来准备等到泰越关系好些，局势缓和后再办干部训练班的，但最后还是办不成。本来泰国华侨多，侨党比较大，当时那里的负责人是梁威林^①，公开办一份共产党的《真话报》，由邱及^②任社长。侨党在那里搞得很突出，有一大片解放区，接近印度支那。后来因当地组织被破坏，干部训练班还是办不起来。

^① 梁威林，曾任广东省第五届政协主席、广东省副省长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。

^② 邱及，曾任北京语言学院院长。

1941年，泰越战争爆发。双方在湄公河隔岸开炮，我们便转移到越南的顺化，在那里总结研究了工作。我们认为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，就要在哪里起作用。当时香港已沦陷，与华南分局联系很困难，顺化学校校长（潮州人）初时叫我去当教员。我认为当地敌人势力大，当教员起不到大的作用。于是他又介绍我去会安创办兴华中学。会安原是个渔港，后来发展成为大埠，学生在学校从小学读到初中。同时，兴华中学也招收一部分年纪大的学生入学，培养侨党干部。办了两年，按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，在学生家长中宣传抗日救国。会安附近的蚬港是个军港，那里也有年纪较大的学生来兴华中学读书。

办学期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日本人打到印度支那，蚬港便驻有日本海军司令部。学校的董事们对办学意见不统一，分成两派。董事长陈XX初时是支持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办学认真；另一派则是动摇派，对我们不信任，认为（我们）宣传抗日、共产。有些人从中挑拨，而董事长本人做肉桂生意，怕我们宣传共产，因此，他也动摇起来，逐渐疏远我们。大多数支持我们办学的校董也是做肉桂生意的，他们通知我说，“这个董事长与蚬港日军有来往”，提醒我注意点。不久，日本帝国主义派人来会安调查“兴华中学”。有人向日本人反映说我们宣传抗日、共产。眼见在学校站不住，我们便于1943年初离开会安到西贡堤岸去。

到了堤岸，由于在会安创办兴华中学有些名望，我被邀请担任南侨中学训育主任。这间学校由华侨集资兴办，是一间比较进步的学校。我到任后进一步把它办成侨党所领导的学校，以后从这里毕业出来的初中、高中学生，不少成为今日国内各党政机关的主要干部，他们在革命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。

在南侨中学教书的教员张翼是华南分局派来的，他的家在越南。当时中学没有成立党支部。校长是位被国民党开除出党的民主人士。教务主任郭湘潭原是共产党员，抗日初期因组织破坏，失去联系。不少教员也是进步的。学校主要根据党的需要培养青年学生，毕业一批输送一批到香港达德学院，然后输送到内地。后来中央中联部、侨办等单位干部中，不少人曾就读于“南侨中学”。

1945年秋，日本将投降，法国重返越南。我们为了扩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民族统一战线，创办了《越南报》。我任副总编辑，张翼也参加报

社工作。日本投降后，我们宣传党中央提出的“和平、民主”口号，并宣传支持“越盟”的解放斗争，通过办报还培养了一批华侨青年，后来输送回祖国当干部。（我们办的报纸）揭发批判蒋介石的分裂、倒退、反共的反动罪行，这样一来，对侨民影响就很大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抗战时期全省最早重建的中共县委

首个中共中山支部在1925年底创建。首个中共中山县委在1926年底成立，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。至1927年，已有党员百余名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山党组织转入隐蔽活动。土地革命时期，随着李华韶、黎炎孟、刘广生等中共组织主要领导人被捕并遇害，全县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，县委停止了活动。1928年2、3月间，中共广东省委派人到中山帮助健全县委组织机构，县委地下活动联络点设在九区低沙。半年内九区的中共组织建立了14个支部，全县有党员140多名。同年8月，中共中山县委改为中共中山特委。

1931年，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山兴起。党的外围组织活动非常活跃，在中山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热潮。期间，由于在香港的省委机关遭受破坏，中共中山组织暂时与省委失去联系。全县各地的中共组织也暂时失去相互联系，1933—1935年中山的革命活动完全处于低潮状态，仅存星星之火。

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孙康，自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，辗转南洋等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。1933年，他回到家乡沙边小学任教，开始一边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，一边秘密寻找党组织。经过多番努力，1936年9月，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（简称“南临委”）和中共广州市委均通知孙康，恢复其组织关系。

恢复组织关系后，孙康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，于1936年10月在沙边小学成立中共中山县支部。这一年，中共组织在中山不断发展，先后在四

区沙边、五区鸦岗小学建立党支部，在石岐、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成立党小组，全县各地党组织也相继恢复。至1937年初，中山的中共党员发展近30人，遂于石岐成立了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（简称“县工委”），隶属于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，所辖6个基层组织。同年8月，经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批准，中共中山县委员会在石岐成立，书记孙康，副书记孙晖如，隶属于中共南方工委外县工作委员会，是抗战初期广东地区中共组织中最早重建的县委。县委机关设在石岐民生北路“太原第”。

中共中山县委重建后，对全县的抗日工作作出了部署：一是加强党的建设，建立和健全各级组织机构，积极发展党员，壮大党的组织力量；二是进一步组织发动群众宣传抗日，为建立抗日武装打基础。中共中山县委的成立，将抗日群众运动推向高潮。

〔整理自《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》（第一卷）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。〕